

香港觀察家看共匪一九六七年糧產

沈國權譯

依據共匪在一九六六年對農業上所作的報告，雖說大陸上很多城鎮發生了非常嚴重的自然災害，却聲稱該年的糧棉作物獲得歷史上最大的收成。這或許是一種誇張性的報告，事實上大陸北方直到該年秋季一直遭受着乾旱災害，不過秋季雜糧作物——玉米、高粱和小米——和馬鈴薯的收穫可能相當好。大陸南方遭受春凍、陰雨、夏澇和十月裏的乾旱。香港觀察家認為，在一九六七年的早期對大陸的農業收成作了稍有增加的估計，這可能和一九六五年時期的產量相若。一九六六年小麥產量為二千萬噸，稻谷為八千三百萬噸，雜糧為五千八百萬噸以及一千九百萬噸的馬鈴薯，其糧食總產量估計約為一億八千萬噸，這和一九六一年以來的收成估計可能低了五百萬噸。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共匪報告浙江（一百廿萬公頃晚稻）、江蘇（九十三萬公頃，顯然近年有所增加）和江西的晚稻有好的收成。稍晚一些時候，洞庭湖地區的湖南省報告，由於該省於一九六六年夏季完成了電灌網，稻米增產了百分之廿，自從一九六四年四月架設了六千公里的電纜和一千五百餘座電灌站的完成，解除了四十萬公頃低產地因受水澇和乾旱的威脅。但廣東省晚稻生產數字未經公佈，該省可能遭受乾旱，正如共匪的廣播，但為何在省晚稻生產數字未經公佈的情況下，該省未能完成儲存雨水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九月廿八日共匪廣播稱：很多農作物的收成超過以往的任何一年，包括竊據大陸時期以前在內，今年夏季和去年同期比較，冬小麥和其他糧食作物的總產量超過百分之十，油菜子生產超過百分之十，早稻和中稻的生產亦豐收……一個最成功的事實就是棉花，棉花連續有四年的好收成，去年（1967）的生長仍然比前年（1966）好……棉花的種植面積已有增加……一般來說，該年（1967）絕大部份地區的气候都很好……。

香港觀察家同意，一九六七年大陸的气候平均都很好，但除了文化大革命進行而外，一九六七年的糧棉收成可能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收成最好的一年，比一九六四年的糧棉總生產增加百分之五，他們認為自一九六四年以來，一九六七年是第二個糧棉的好收成——一九五八年是最好的年辰。但一九六七的收成却因農村的交通而受到影響。共匪實際上沒有說明糧食作物收成的

紀錄，因為此一報導可以去解釋以後糧食短缺的問題，一九六七年匪區的問題不是收穫的問題而是分配的問題。去年九月下旬顯然地解放军報登了一篇文章來說明，尤其報導在一九六七年糧食輸入到華北糧食不敷地區，輸入之數字低於缺糧最高紀錄的百分之七十五，其他地區也是一樣。可能這一聲明是意圖保證華北地區城市人口可以得到充分的糧食供應，文章中並強調了家畜的情況。

香港所有的觀察家們——特別鑑於一九六六年冬小麥可能以低產之故——對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匪刊物報導匪區一九六六年全匪區夏收增加到百分之十的數字無意爭辯。很多地區和公社據說增加生產最顯著的措施是他們計劃想達成糧食的運送和出售一九六七年的夏收作物。不論怎麼說，政治上的紛亂可能會影響到農業生產，至少在一些大城市中紅衛兵的暴亂會使鄰近的地方受到影響，紅衛兵們在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有數千人下放到農村和農民結合。其後依推測農民的紅衛兵活動嚴重地影響到農業工作，由是，去年底共匪人民日報警告革命學生，凡是工業和農業生產範圍，不要去干涉。一九六七年的遠景投下了暗影，這特別是由於最富裕地區的華中和華南似乎是一個最大的主題，那就是黨內所發生的相互傾軋的現象。

一九六七年的早稻幾乎全部都很好，去年八月初據報廣東——一九六七年廣東早稻種植面積為一百八十六萬公頃，而一九六六年為一百八十萬公頃——廣西、福建、湖北、湖南、浙江和上海郊區等地增產的限度超過一九六六年，雲南據報早稻增產也創了紀錄，因該年沒有發生澇災和颱風的災害，故中稻方面情況也應該很好。

正當共匪誇張其農業大好之際，我們却懷疑共匪所報導的與真正的事實不知有多少距離，自去年九月中旬共匪新華社報導了所有情況，該一政府性的新聞機構，以毛林派控制了所有的省市情況為名，其實以全大陸來說却是佔着一極小的比率而已。可能是一種空論——認為一九六七年農業的好收成乃基於農民們熱忠於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或是加強了對大陸上控制之力量所致。事實上全大陸似乎均處於缺糧的景況下，只有黑龍江一省僅能維持自

給自足，除此而外共匪就沒有透露有關其他地區農業的情況。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那就是關於大陸上的運輸問題，一九六七年初共匪新華社報導了關於運輸上所遭受的影響，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五類壞份子，在春耕期間企圖破壞生產，在夏收期間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河北省東方農村的農民把公社的福利金、公積金和生產準備金分光；在另一方面，農民要求高工分，並且湧入城市圍攻革命左派，這顯然是想爭取希望能夠獲得較好的待遇。

在農村共匪加給農民所謂經濟主義的罪名，這顯然與農民再提出要求保有生產中較高收益或報酬有關。一九六七年農民們鑑於處此多事之秋之際企圖積存一些糧食以備不時之需。同時駐軍和當地政府也希望自己能多貯存些糧食。如果當地政府和匪黨中央之間情況不好時，則助長在行政上的控制和

國際人物

新任美軍駐越司令 艾步蘭將軍 李少唐

「改變越戰必先改

變領導」

早自去秋十月，美國防部長麥納瑪拉辭職之後，一般咸即預料美國對越政策將可能作若干調整，迨今年三月初，美軍駐越司令魏摩蘭調職消息傳出，白宮同時重新檢討越戰政策，這種政策改變的可能性遂益為確定，再配合詹森總統一再聲明美國隨時隨地準備和談的表示，若干觀察家乃據此倡言越戰降低的論調。

事實上，美國在越南每年投入數百億金元及數十萬子弟兵從事這場戰和兩難的艱苦戰爭，所肩負的包袱無

疑至為沉重而極思加以輕卸，但是，與要求和談的同時，美國亦有其維護越南獨立與安全的決心與責任，在這個大前提之下，顯而易見地，不論降低越戰或進行和談，將都只不過造成在戰場以外的另一個對峙局面，甚且反遭越共以可乘之機。這固是詹森總統以下深謀遠慮之士所瞭然於心而引為惕勵的，而越戰之必須別關



頻繁的運輸量方面將會有鬆懈的傾向，但當地的運送量可能提高，但對匪黨中央之間可能會減低，這對整個大陸的經濟情況來說將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如果大陸的混亂情況再繼續長久下去，則生產本身將會遭受困難，雖說一九六七年底以前沒有受到天災的損壞，然一九六六—六七年期間水利的維護和修建方面却疏於工作，且農業遭受了運輸上的困難和農村供應物品的短缺。一九六七年華北和華東建立了「生產第一線」，據說這是幫助人民解決春耕和生產計劃，並且還組織了商業隊和運輸隊保證及時供應化肥、種子、農業機械和設備等。然而生產第一線是少數的地方才有，在華南的稻米生產區，即便像主要產米區的廣東省，雖然遭受了嚴重的蟲害和銹病，但據最近報告農業供應短缺未能作及時的撲滅工作。

譯自H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Year Book of 1968 P. 158.

蹊徑另謀發展，實亦勢所必然不得不爾。漸將越戰重任交給越南人，但仍繼續供應火力及支援，俾越南人得以從事有效的戰爭。這是美國新任國防部長柯立福在其首次記者招待會上所宣佈的，艾步蘭將軍則將於七月份起正式擔任美軍駐越司令的重任。

職此之故，儘管華盛頓與河內方面已經透過微妙的外交接觸，分別派出以哈里曼及春生為首的代表團坐上巴黎的談判席，進行所謂「和平」的試探，美國却在不久以前宣佈了對越戰戰略的重大改變，並如一位青年軍官所說的「要改變越戰必先改變領導」，任命一名新統帥——現年五十三歲的四星上將克里頓·威廉斯·艾步蘭——去執行這項新戰略，即：美國逐

南

「戰鬥任務轉交越

越南人終須負起捍衛其國土的任务，這種看法絕不自今日始。對美國故總統約翰甘迺迪而言，這不僅只是一種直截了當的「看法」，更是一種至深的「信念」，因為「這是他們的戰爭，他們必須贏得勝利」。詹森總統亦表示：要以美國可以接受的人員和時間的代價來獲取越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如果作進一步的探究，可知美國之決定將戰鬥任務轉交越南共和國陸